

农村妇女的生育决策权与生育率

金和辉

【提要】 本文对内蒙、青海、甘肃、宁夏4省区11个贫困县33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1)在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女性不仅在期望生育的数量上低于男性而且对生男生女更加无所谓;(2)绝大多数女性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并没有实质性发言权,她们关于生育子女数量、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的愿望,均受到严重忽视;(3)一旦女性在生育决策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便会有效地降低生育率,特别是对那些生育率很难控制的贫困农户而言,其作用尤为重要;(4)在影响女性生育权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和参与生产的程度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无疑将成为提高贫困地区妇女生育决策地位、从而降低生育率的有效途径。

【作者】 金和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关于妇女地位与生育率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的总体的问题,深入细致的微观分析不多,同时也缺乏对男女两性人口的对比研究,尤其是缺乏针对贫困地区的专门研究。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妇女的生育意愿究竟如何,她们的生育意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实际的生育率,怎样才能降低其期望子女数并使之产生实际效果?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问题仍然缺乏透彻的理解。

1993年11月至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应邀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妇女参与与发展”项目作基础研究,在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自治区4省区的11个贫困县组织了一次农户抽样调查。此次调查共包括330个农户。除了农户家庭财产、收入、消费、营养投资、和信贷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对妇女教育、健康、就业、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行为等作了较深入的了解。生育方面的调查主要针对已婚育龄妇女及其丈夫和家庭。共有300个已婚育龄妇女对有关生育方面的问题做了有效回答。这些妇女的年龄平均为33.1岁,最小19岁,最大45岁;初婚年龄平均为20.6岁,最小16岁,最大28岁,平均每对夫妇的婚龄为12.5年。以此次调查的数据资料为基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4个问题:(1)在贫困地区,妻子、丈夫与家庭的生育意愿之间是否存在重要的差异;(2)如果存在差异,实际生育行为主要被谁控制;(3)相对于丈夫和家庭而言,当妻子对于其生育行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时,是否会对生育率的降低产生显著影响;(4)女性的生育决策权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调查地区农户中妻子、丈夫和家庭的生育意愿作出描述、概括和对比;第二部分描述生育决策权的配置状况,并将不同家庭成员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的生育行为作对比分析;第三部分探讨影响实际子女数的重要因素,并采用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方法,辨别各种影响因素对生育率的独立影响,同时指出女性生育自主权对降低生育率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仍然以回归分析为基础,探讨女性生育决策权的决定因素;最后是简短的结语。

一 生育意愿

男女双方的生育意愿是否存在差异,目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一些学者如考德威尔(Caldwell)曾提出丈夫和妻子有着截然不同的生育意愿,但能够找到的事实尚不能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Hollerbach, 1983)。中国妇联的全国性调查也曾发现女性的期望子女数略少于男性,但差别不明显(陶春芳、蒋永萍, 1993)。然而,在我们所调查的地区,却发现了比较明显的差异。

表1给出了有关妻子、丈夫和家庭生育意愿的统计结果。这里,妻子和丈夫生育意愿指在不考虑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配偶和其他家庭成员意见的条件下,本人的生育意愿。家庭生育意愿与妻子及丈夫的意愿均有不同,它同时还反映了公婆等其他重要家庭成员的期望,代表着整个家庭的总体生育意向。从表1看,被调查者的生育意愿大致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在期望子女数方面,无论是妻子、丈夫还是家庭比较集中的是2个孩子,占60%左右,同时也有22%的妻子、28%的丈夫和32%的家庭希望要3个以上孩子;而在子女性别偏好方面,85%以上的妻子、丈夫和家庭都希望有至少有1个男孩。因此,尽管绝大多数农村夫妇所期望的子女数并不超过2个孩子,但由于强烈的性别偏好,为了获得期望数量的男孩,他们的实际生育数却是非常有可能超过期望子女数的。第二,分年龄组看,较年轻的夫妇(妻子年龄低于36岁)大多希望要较少的孩子,期望子女数不超过2个的占80~85%,同时,其男孩偏好也要稍弱一些。第三,妻子、丈夫和家庭的生育意愿存在着明显可见的差别,这是本次调查得到的一个重要发现。从总体上看,与丈夫相比妻子所期望的子女数更少、性别偏好更弱;丈夫的

表1 妻子、丈夫和家庭的生育意愿

	妻子年龄低于36岁的夫妇			全部夫妇合计		
	妻子	丈夫	家庭	妻子	丈夫	家庭
有效样本个数	173	173	173	300	300	300
期望子女数量(%)						
不要孩子	0.6	0.0	0.0	0.3	0.0	0.0
1个孩子	22.5	13.3	11.6	18.3	11.0	9.0
2个孩子	62.4	71.1	69.4	58.0	60.7	58.0
3~4个孩子	12.7	13.9	16.2	21.7	25.0	28.7
4个以上	1.2	1.2	2.3	1.0	2.7	3.7
无所谓	0.6	0.6	0.6	0.3	0.3	0.3
其他	0.0	0.0	0.0	0.3	0.3	0.3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对男孩的偏好(%)						
无所谓	15.0	9.2	7.5	13.3	6.3	5.7
一个男孩	64.7	64.7	63.6	57.3	52.3	48.0
至少两个男孩	19.7	25.4	28.3	28.7	40.7	45.7
其他	0.6	0.6	0.6	0.7	0.7	0.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期望子女数又比家庭的少, 性别偏好也更弱, 这可能主要来源于丈夫与其父母等在生育期望上的不同。

妻子与丈夫相比较, 妻子期望子女数小于丈夫的夫妻有44对, 占14%, 而丈夫期望子女数小于妻子的只有3对, 仅占1%, 前者比后者高出将近13个百分点。同样, 妻子与家庭以及丈夫与家庭之间都存在着类似的差别。如表2所示, 差异在不同年龄段都有发生, 但较年轻的夫妻之间出现差异的频率也相对较小。同时, 无论年龄段如何, 也无论是期望子女数还是性别偏好, 妻子与丈夫及家庭之间的差别都远远高出丈夫与家庭之间的差别。换言之, 家庭的总体生育意向与妻子的相差颇大, 看来主要是由男性一方(丈夫及其父母)来决定的。

表2 生育意愿差异的比较和检验

比较对象		差异的样本数			差异的频率%			皮尔逊X ² 统计量
A (1)	B (2)	A<B (3)	A>B (4)	合计 (5)	A<B (6)	A>B (7)	合计 (8)	(9)
期望子女数量(全部300对夫妻)								
妻子	丈夫	41	3	44	13.7	1.0	14.7	32.8
妻子	家庭	59	3	62	19.7	1.0	20.7	50.6
丈夫	家庭	24	3	27	8.0	1.0	9.0	16.3
男孩数量偏好(全部300对夫妻)								
妻子	丈夫	54	4	58	18.0	1.3	19.3	43.1
妻子	家庭	69	4	73	23.0	1.3	24.3	57.9
丈夫	家庭	18	1	19	6.0	0.3	6.3	15.2
期望子女数量(妻子年龄不大于35岁的夫妻)								
妻子	丈夫	20	1	21	11.6	0.6	12.1	17.2
妻子	家庭	28	2	30	16.2	1.2	17.3	22.5
丈夫	家庭	10	1	11	5.8	0.6	6.4	7.4
男孩数量偏好(妻子年龄不大于35岁的夫妻)								
妻子	家庭	20	3	23	11.6	1.7	13.3	12.6
丈夫	家庭	26	3	29	15.0	1.7	16.8	18.2
丈夫	家庭	7	0	7	4.0	0.0	4.0	7.0

注: 皮尔逊X²统计量用于检验假设H₀: $P(A>B) = P(A<B)$, 此处 $P(A>B)$ 指A偏好的数量大于B的概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 X²统计量的临界值是6.64。若X²统计量大于此值, 则拒绝该假设。

不过, 我们的样本量毕竟不是很大, 同时差异出现的频率也不是很高, 除妻子与家庭之间的性别偏好差异外, 其它均低于20%。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表2所揭示的差异, 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换言之, 它们究竟是揭示了实际存在着的偏差, 还是仅仅反映了随机因素的干扰? 表2中的第(9)列数据是利用皮尔逊X²统计量对此作的检验。结果表明, 此表中所有的偏好差异, 在0.01的显著性水平(或99%的置信度)上显著。由此看来, 这些地区的农村女性平均说来不仅确实比男性希望更少的孩子, 而且对生男生女更加无所谓。

与其他研究的结论相仿, 在我们的样本中女性的生育倾向同样受到教育和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随着教育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希望生育3个以上孩子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而1个孩子的比重明显上升, 同时男孩偏好也有所减弱。分民族看, 在期望子女数上, 除回族妇女大多

希望生3个以上孩子外，其他民族妇女基本上相差不大；就男孩偏好的强弱而言，汉族最弱，蒙族次之，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最强。

二 生育决策权

既然生育意愿存在着差异，一个自然的问题是，生育决策主要由谁来作出，实际生育行为主要为谁的偏好所左右？调查中有关生育决策权的统计结果表明，在300对夫妻中，认为生育决策主要由丈夫决定和主要由妻子决定的夫妻各占22%左右；41%的夫妻报告说他们的生育决策既不是以丈夫为主，也不是以妻子为主，而是由家庭共同决定的；此外还有14%左右的夫妇报告说其生育行为受到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①。初看起来，在生育决策权方面，男女两性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也与其他有关调查的结论大体相近。例如熊郁(1993)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对上海、山东、陕西和广东四省妇女地位的调查数据，发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男女两性在生育决策权上的地位都比较平等。

但是，就我们的样本而言，作出这一结论必须慎重。上文的分析已经指出，家庭的总体生育意向事实上主要反映了男性一方及其家庭成员（如父母等）的生育意愿，而与女性自己的生育意愿相差甚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由家庭作出的生育决策，依据的主要是男性一方的意愿，妻子的愿望在其中并不起实质性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解释上述统计结果，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只有22%左右的妻子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拥有实质性发言权。

表3 实际子女数与期望子女数的差别

类别	妻子	丈夫	家庭
1. 期望生一个孩子			
样本数	55	33	27
实际生育多于期望的比重(%)			
未调整	60.0	45.5	37.0
调整后	36.4	18.2	14.8
2. 期望生两个孩子			
样本数	171	180	172
实际生育多于期望的比重(%)			
未调整	34.5	29.4	27.3
调整后	23.4	19.4	18.0

注：“调整后”指按男孩偏好进行调整后的结果，即扣除了那些实际子女数多于期望，但在生最后一个孩子前未获得其期望男孩数的样本。此数据可以更好地反映实际生育与偏好的相差程度。

比较实际生育数与不同家庭成员生育期望子女数的差别，可以更深入了解生育决策权的实际配置状况。如表3所示，在期望生1个孩子的妻子中，实际生育了2个以上存活子女的比重高达60%；而在期望生1个孩子的丈夫和家庭中，相应比重仅为46%和37%。应当指出，这些比重数都未考虑男孩偏好对生育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反映实际生育数与期望的相差程度，可以针对男孩偏好进行调整，即扣除那些实际生育数多于期望数，但在生最后一个孩子前未获得其期望男孩数的样本。调整后妻子、丈夫和家庭的上述相应比重分别为36%、18%和15%。由此可见，实际生育数与妻子期望数的相差程

① 在调查过程中，生育决定权根据被调查妇女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进行分类：

(1) “在怀孕和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上，您自己能作主？”若回答为“是”则归于“妻子决定”，否则进行下一问题。

(2) “你丈夫能作主？”若答“是”则归于“丈夫决定”，否则进行下一问题。

(3) “你们家（你、你丈夫和公婆等合在一起）能作主？”若答“是”则归于“家庭决定”，否则继续下一问题。

(4) “这是不是因为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若答“是”则归于“政策限制”，否则归于“其他”（“其他”类还包括对问题2或3回答为“不清楚”的样本）。

度,要远远高于其与丈夫和家庭的相差程度。同样,在期望生2个孩子的样本当中,实际生育数与期望生育数之间也有类似的差别(表3)。这些结果清楚地说明,生育行为常常为男性一方所控制,相当一部分农村妇女实际上是违反本人意愿被迫多生孩子。

事实上,在生育过程中被忽视的并不仅仅是女性对生育子女数量方面的愿望,她们关于生育年龄和最佳生育间隔的愿望同样也常常不能实现。被调查的妇女中,绝大多数(82%左右)希望在22~24岁生育头一个孩子,75%以上的妇女所期望的生育间隔是3~4年。但是在已经生育的妇女当中,一半以上妇女生头胎年龄都早于自己所期望的理想年龄,提早的年数平均为2.6年;在生育过2个以上孩子的妇女当中,生育间隔短于自己期望间隔的占80%左右,平均缩短1.7年。很明显,这些妇女不仅被迫多生孩子,而且被迫在更早的年龄、以更短的间隔生育。这不能不影响到妇女自身的健康和下一代的素质。在我们的样本中,虽然30岁以下年龄段中男女两性的发病率差别不大,但中年以上妇女的发病率比同年龄段的男性高出近2倍。这可能与不健康的生育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关的统计结果还表明,生育决策权的分配,随着地区、民族、年龄、教育和收入的不同而异。一般而言,汉族和蒙族的妇女拥有相对较大的决策权,而回族妇女的决策权最少,其生育决策几乎完全由丈夫控制。分年龄段看,较年轻的妻子有相对较多的决策权。从教育水平看,文盲妇女的决策权大大低于受过教育的妇女,但在受过教育的妻子中间,受教育年数似乎并不对决策权产生明显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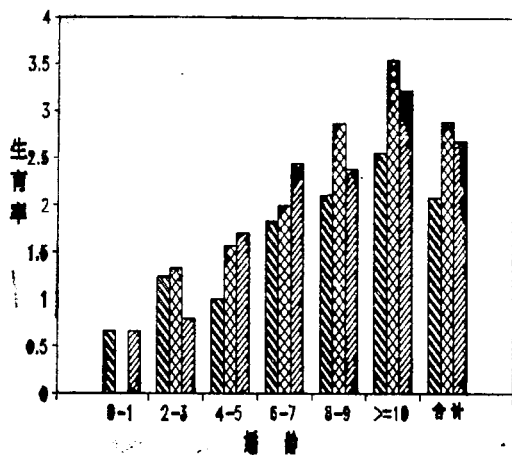
在分析收入水平的影响时,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认为其生育行为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农户比重,随着收入水平下降而大幅度减少。在人均收入高于700元的117个农户中,将近1/4的农户报告说其生育行为受到计划生育政策限制;而在人均收入低于500元的124个农户中,尽管希望生育3个以上孩子的比重超过30%,但只有不到5%的农户认为其生育行为受到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看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只能对那些收入较高的农户作出有效控制,而低收入的农户,计划生育政策则很少能产生实际作用。

三 实际子女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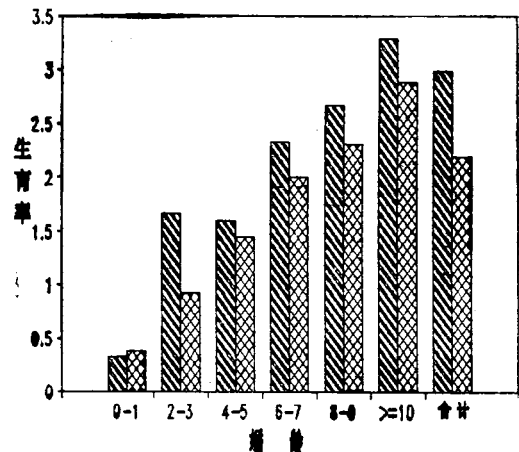
在调查到的300对夫妇中,平均每对夫妇拥有的子女数为2.45个。按婚龄分组,结婚0~1年的夫妇占5.33%,平均子女数为0.38个;结婚2~3年的占9.33%,平均子女数为1个;结婚4~5年和6~7年的各占7.67%,平均子女数分别为1.48和2.04个;结婚8~9年的占10.67%,平均有2.41个孩子;结婚10年以上的占59.33%,平均有3.06个孩子。在已经生育过1个以上孩子的281对夫妇中,绝大多数(67%)是在结婚一年左右就生育头一个孩子的,妻子生头胎的年龄平均仅有21.8岁。在拥有2个以上孩子的夫妇当中,一孩和二孩的生育间隔平均只有两年多一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结婚满7年的夫妻当中,已有3个以上孩子的高达50%。看来,要控制住贫困地区农村的生育率,任务还极其艰巨。

既然妻子的期望子女数显著低于丈夫和家庭,我们自然可以预期,当女性拥有生育自主权时,生育率应当可以降低。初步统计的结果表明,情况确实如此。在妻子对生育决策拥有实质性发言权的67对夫妇中,平均子女数仅为2个,远远低于主要由丈夫和家庭控制生育的家庭(平均子女数分别为2.89和2.69)(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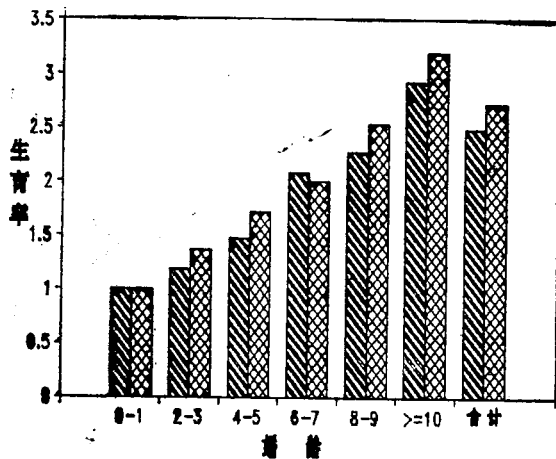
妻子的教育水平对生育率有重大影响。如图2所示,与受过教育者相比,文盲的子女数平均要高出35%左右。



生育决定权 妻子 丈夫 家庭
图1 生育率与决定权



文盲 识字
图2 生育率与教育水平



男 女
图3 生育率与头孩性别

图3显示了头孩性别与生育率的关系。在绝大多数婚龄组别,头孩为男孩时的子女数均低于头孩为女孩的场合,平均降低的幅度约为10%左右。同时,头两孩的性别与子女数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相关性:头两孩均为男孩时继续生育第三个孩子的频率,普遍低于头两孩为一男一女时,后者又明显低于头两孩均为女孩时。不难看出,与期望子女数相比,性别偏好往往对生育率起着支配性作用。

为了进一步判别各个影响因素对生育率的独立影响,可以采用带有虚拟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在控制其他因素作用的情况下,观察某个因素对生育率的净影响,并对不同因素作用的大小和统计显著性进行比较。

回归因变量是各对夫妇的子女数。回归自变量选取了10个,以反映不同因素的影响(见表4)。

所选取的自变量除年龄外,其它均为虚拟变量。虚拟变量的构造方法是,先对有关的原始变量进行分组,选择其中一组作为比较的基准或参照系,另外各组则转换为相应虚拟变量。根据此处所关心的问题,我们选择的参照系是:文盲、人均收入千元以上、家庭决定生育、头孩为女孩、汉族、内蒙古地区以及结婚10年以上。排除掉某些观察值丢失的样本后,回归分析所用的样本总数为290个。

表4给出了3组多元回归的结果。回归1包括了全部自变量。由于所有有关丈夫年龄和教育的变量均不显著,因此在回归2中我们删去了这些变量。以回归2为基础,回归3进一步删去了极不显著(t -值小于1)的其他变量。从调整 R^2 看,回归3的拟合优度最佳,因此我们的讨论

表4

实际子女数的决定因素：标准回归结果

变 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系 数	t-值	系 数	t-值	系 数	t-值
常数	0.408	0.717	0.535	1.021	0.341	1.062
妻子年龄	0.059..	2.780	0.067**	5.514	0.072**	8.694
丈夫年龄	0.008	0.448				
妻子教育年数						
1~5年	-0.126	-1.051	-0.112	-0.974		-1.586
6~8年	-0.203.	-1.533	-0.201*	-1.580	-0.163*	-2.174
9~12年	-0.332..	-1.940	-0.339**	-2.044	-0.313**	
丈夫教育年数						
1~5年	0.086	0.540				
6~8年	0.094	0.582				
9~12年	0.028	0.171				
人均收入水平						
低于300元	0.273**	1.764	0.289	1.907	0.201*	1.601
300~500元	0.228*	1.594	0.233	1.648	0.152*	1.344
500~700元	0.066	0.458	0.072	0.507		
700~1000元	0.172	1.226	0.171	1.246	0.134	1.132
头孩为男孩	-0.097	-1.076	-0.099	-1.118	-0.111*	1.284
生育决定权						
妻子	-0.495**	-4.260	-0.512**	-4.664	-0.503**	-4.675
丈夫	0.052	0.367				
政策控制	-0.487**	-3.413	-0.498**	-3.619	-0.478**	-3.658
民族						
回族	0.252	1.249	0.271*	1.474	0.256*	1.440
蒙古族	0.257**	1.764	0.241**	1.680	0.224**	1.968
其它少数民族	0.051	0.263	0.051	0.264		
地区						
青海	0.057	0.302	0.063	0.342		
宁夏	-0.103	-0.641	-0.098	-0.617		
甘肃	0.264*	1.580	0.259*	1.627	0.298**	2.378
婚龄						
0~1年	-1.578**	-5.739	-1.586**	-5.967	-1.530**	-6.993
2~3年	-0.873**	-3.757	-0.888**	-3.928	-0.822**	-4.623
4~5年	-0.700**	-3.115	-0.713**	-3.251	-0.631**	-3.535
6~7年	-0.051	-0.244	-0.074	-0.359		
8~9年	-0.061	-0.343	-0.073	-0.415		
R ²	0.670		0.666		0.665	
调整R ²	0.636		0.642		0.647	
样本数	290		290		290	

注：**代表该系数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不同于零；*代表该系数在0.2的水平上显著。当我们关注单边比较，即系数是否显著大于0（或显著小于0）时，则**代表该系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该系数在0.10的水平上显著。

主要依据回归3进行。

回归分析的主要结论可以概述如下。第一，生育率与丈夫教育水平基本上没有任何显著的关系，但与妻子教育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从3个教育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看，小学文化程度（1~5年教育）妇女的生育率与文盲基本上没有显著差别，而初中（6~8年教育）和高中以上（9~12年教育）文化程度的生育率，则分别以90%和95%的置信度显著低于文盲。这与其他研究者根据全国性资料分析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刘佩航、顾宝昌，1993）。我们的结果则进一步证实，即使在边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初中文化同样是生育率降低的转折点。

第二，从收入水平的作用看，当人均收入高于500元以后，生育率便不再随着收入变动而出现显著差别；而收入低于500元的贫困农户，生育率却显著高于其他农户，高出幅度大致在1~2个孩子之间。很明显，这些农户正是降低农村生育率的关键之所在。但是，我们前面的分析指出，这些农户也正是其生育行为很少受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的死角。因此，如何找出有效途径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第三，如回归3所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头孩为男孩时的子女数会显著减少。这说明，性别偏好对生育率有着重要的独立影响。

第四，主要由丈夫决定生育和主要由家庭决定生育，实际子女数没有多大区别。而当生育行为主要由妻子自主决定或受到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时，生育率都显著地降低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妻子决策权和政策控制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值和显著性看，女性自主权在降低生育率方面的效果，丝毫不亚于政策控制的作用。看来，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而言，提高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地位，无疑可以成为降低生育率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四 生育决策权的决定

如何才能提高农村女性的生育自主权？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探明，女性的生育自主权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关于家庭内部决策权力的分配，理论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分析着眼点。一种观点将家庭视为由分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认为决策权的分配是出于家庭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一方面由于分工的不同，家庭成员在各自的分工领域中逐渐积累了不同的经验、知识、信息、技能和才干，使之在不同的决策问题上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不同成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在同一决策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假如通过反复磋商、讨论、说服而达成一致意见，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并有可能导致决策拖延失效，那么，将决策权集中于在决策问题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个人之手，便是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同家庭成员有着各自不同的个人偏好和利益，决策权的分配实际上取决于讨价还价力量的强弱对比。而讨价还价力量的强弱，则不仅受制于由分工而形成的经济地位高下之分，也与男女双方的家庭背景以及当地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密切相关。

考虑到我们样本中男女两性在子女数量、子女性别、生育时间和生育间隔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和矛盾，我们将采用讨价还价说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并进而提出一个假说：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权的分配，与结婚时和结婚后男女双方的经济地位对比密切相关；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将会显著扩大她在生育行为中的自主权。这里我们还将把这一假说具体化，构造一个模型，用我们的调查数据来检验它。

此处所选择的分析对象是那些结婚不足10年、子女数少于3个的夫妇。符合这两个条件的

样本数共有102个。其中妻子年龄平均为25.5岁，丈夫平均为26.7岁；平均受教育年数，妻子为4年，丈夫为6年；每对夫妇结婚的年数约为4.4年，平均有1.33个孩子。从生育决策权看，以妻子为主的占28.4%，以丈夫和家庭为主的占54.3%，其余17.3%认为其生育行为主要受到政策控制。

之所以要对样本作上述限制，有两个理由。第一，由于缺乏资料，我们只能用1992年妻子与丈夫的就业和收入数据近似反映整个生育期间的有关情况。如果婚龄过长，则这些数据

表5 妻子生育权的决定因素：LOGIT回归结果

	回归 1		回归 2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常数	-2.632	-0.477	-4.790*	-1.317
劳动时间比（取对数）	0.811*	1.383	1.070**	2.012
妻子非农就业	0.612	0.346		
丈夫非农就业	-0.683	-0.773		
妻子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上文化	1.246	1.099	0.855*	1.301
初中	-0.514	-0.594		
高中及以上	-0.698	-0.618		
丈夫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上文化	-1.263	-0.661		
初中	-1.756**	-1.984	-2.100**	-2.630
高中及以上	-3.011**	-2.325	-3.676**	-3.311
生产性固定资产	-0.024**	-2.181	-0.027**	-2.875
耐用消费品	-0.006	-0.142		
妻子19~20岁结婚	-4.230**	-2.549	-4.647**	-3.120
妻子21~22岁结婚	-2.465**	-1.986	-2.839**	-2.444
妻子23~24岁结婚	-0.995	-1.071	-1.131	-1.201
住房条件	0.896*	1.418	0.650	1.242
与水源距离	-0.007*	-1.593	-0.007**	-2.053
妻子年龄	0.241*	1.486	0.290	2.213
民族				
回族	-1.840	-1.198	-2.072*	-1.547
其他少数民族	0.196	0.175		
地区				
青海	1.237	0.930	1.423*	1.563
宁夏	-0.289	-0.178		
甘肃	0.779	0.541		
对数似然值	-36.262		-37.779	
PW=1的样本数	29		29	
PW=0的样本数	73		73	
样本数	102		102	

注：符号**代表该系数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不同于零，符号*代表该系数在0.2的水平上显著。当我们关注单边比较，即系数是显著大于0（或显著小于0）时，则符号**代表该系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符号*代表该系数在0.10的水平上显著。

不能适用；婚龄过短，则样本数太少。作为折中我们取限制条件为结婚不到10年。第二，子女数不到3个的夫妇正处在其生育决策的关键时期，生育决策权的分配，对他们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地位，可以用一个名为PW的变量来反映。对每一对夫妇，当生育决策主要以妻子为主时，PW取值为1，否则便取值为0。这将作为我们模型的因变量。为了便于在相同年龄、相同地区和相同民族的条件下作比较，模型的自变量中首先纳入了年龄变量、地区和民族虚拟变量，起控制作用。其他变量则与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夫妻双方的经济地位有关。

由于农户主要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在其收入中明确区分出不同家庭成员的贡献，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得用不同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文化素质和非农就业状况，来近似反映他在家庭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一般而言，妻子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越多、文化素质越高，其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便越高；反之，若丈夫的劳动时间越多、文化素质越高，则妻子的经济地位便相对越低。我们用妻子参与生产劳动的时间与丈夫劳动时间之比，来衡量其参与经济活动的相对程度。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非农就业便成为扩大农户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个人参加非农就业将会明显提高其经济地位。在这里，非农就业状况用虚拟变量来反映：当有关的个人参与非农就业时，它取值为1，否则便取值为0。

结婚时男方家庭与女方家庭的经济背景同样会影响到生育决策权的分配。由于调查中很少搜集到这方面的数据，这里只能利用一些间接资料进行推断。我们用家庭现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来反映男方家庭的经济实力。其原因在于，与耐用消费品不同，生产性固定资产很少成为女方的嫁妆，而是主要由男方家庭置办的。同时，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农户极少进行生产性投资，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年际间变动极为缓慢，现有的资产原值与结婚时差别将不是太大。为比较起见，现有的耐用消费品价值也作为自变量加入模型。至于女方的家庭经济背景，我们则用3个有关妻子初婚年龄的虚变量来反映，它们分别代表19~20岁结婚、21~22岁结婚和23~24岁结婚。原因很简单：在农村地区，越是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女儿便出嫁得越早。

此外，在我们所调查的地区，村与村之间基本生活条件相差颇大。此处用2个变量来控制这一因素对女性生育决策权的影响。一个变量是平均住房条件，用每个农户砖木以上结构住房的面积来衡量。另一个是与水源的距离。在调查地区，水是极为匮乏的资源，因此与水源的距离便成为衡量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标准。可以预期，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将有助于扩大女性的生育决策权。

由于因变量PW仅取值0和1，通常的标准回归模型并不能适用。适合于处理这种情形的模型之一是如下的LOGIT模型，它将女性拥有实质性决策权（PW=1）的概率与上述各个自变量联系起来，即：

$$\text{Prob}(PW=1) = F\left(\sum_{k=0}^K \beta_k X_k\right)$$

此处：Prob(PW=1)：PW=1的概率；

F(·)：Logistic概率分布函数；

K：自变量个数；

β_k : 第k个自变量的系数, 其中 β_0 为常数;

X_k : 第k个自变量。

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5所示。各个有关男女双方经济地位和当地基本生活条件的变量都有预期的正负号。在3个有关就业情况的变量中,妻子参与家庭经济活动的相对程度对其生育决策权有着极为显著的作用,而非农就业状况则不显著。但后者并不意味着非农就业不重要,而是由多重共线性所致,即参与非农就业的个人普遍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因此非农就业的作用已经包含在教育变量的系数中了。

从教育的作用看,与文盲妇女相比,小学及以上教育可以较为显著地提高女性的决策地位,但进一步的初中和高中教育对决策地位的继续提高则似乎没有显著作用。丈夫教育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小学教育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初中及高中以上教育则明显降低了妻子在家庭中的相对经济地位,其作用显著为负。考虑到我们样本中妻子的文盲率高达20%,而丈夫仅有5%左右,出现这一结果是相当自然的。

在几个有关双方家庭经济背景的变量中,固定资产的系数显著为负,而耐用消费品则不显著。这证实了我们前面的推测,即固定资产确实更好地反映了男方的家庭经济背景。与女方的家庭经济背景相联系,在初婚年龄不超过22岁的妇女中,结婚越早则决策地位越低,但超过22岁以后,结婚迟早便对其决策地位没有明显影响了。这与我们实地调查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

最后,两个反映基本生活条件的变量的作用都较为显著,其中与水源的距离尤为重要。看来,基本生存条件对女性生育决策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综上所述,回归分析基本上证实了我们前面提出的假说:女性的生育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在家庭中的相对经济地位。同时也表明,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参与生产的程度是其经济地位和生育自主权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尤其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样本中,女性的教育水平平均比男性低出1/3,而其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比男性低出近40%。这说明,通过提高女性文化程度和改善其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来提高其在生育决策中的地位,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五 结语

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述如下。第一,在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女性不仅在总体上比男性希望生育更少的孩子,而且对生男生女更加无所谓。第二,一旦女性在生育决策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便会有效地降低生育率。特别是对那些计划生育政策很难控制其生育率的贫困农户而言,其作用尤为重要。第三,绝大多数女性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并没有实质性发言权,她们关于子女数量、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的愿望,均受到严重忽视。第四,在影响女性生育权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和参与生产的程度,被证明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

这些结论的政策涵意是十分明确的:提高妇女地位和降低生育率,可以从扩大妇女参与入手。更具体地说,通过有效的中介机构,在教育、培训、就业、信贷和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为妇女提供服务,提高其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扩大其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无疑将成为提高贫困地区妇女的生育决策地位,从而降低生育率的有效途径之一。

事实上,妇女参与与农村发展的联系远比本文所揭示的内容广泛得多。在贫困地区,妇女每天花在家务和生产上的劳作时间不仅比男子更长,常常也更为辛苦。与男性相比,她们更为关心家人和子女的健康,也更为关心孩子特别是常常为丈夫所忽视的女儿的教育和未来。

这就使得她们对贫困有着远为深刻痛切的感受,从而产生出强烈的发展愿望。高生育率不仅给她们带来比男性更为沉重的直接负担,而且大大降低了她们的经济地位,严重打击了其发展愿望。在这个意义上,妇女可以说是高生育率和贫困的最大受害者,因而也是高生育率和贫困的抗争者。采取措施切实帮助她们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农户收入并减少贫困,而且可以有效提高妇女在家庭经济决策和生育决策中的地位,后者又可以从增进农户储蓄水平、扩大其生产性投资、降低生育率、提高子女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给脱贫致富的努力注入新的活力(金和辉,199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妇女参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完全可以成为打破高生育率、贫困和妇女地位低下之间恶性循环的有效手段。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考 文 献

1. 陶春芳、蒋永萍主编:《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北京。
2. 陶春芳:《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况》,载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编《中国妇女问题研究论文集》,第28~35页,1993年5月,北京。
3. 金和辉:《妇女参与与发展项目基础研究农户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报告,1994年7月。
4. 熊郁,“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的报告——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的研究”,载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编《中国妇女问题研究论文集》第8~24页,1993年5月,北京。
5. 朱楚珠、蒋正华著:《中国女性人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6. 刘佩航、顾宝昌:《妇女人口研究回顾与展望》,载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编《中国妇女问题研究论文集》第28~35页,1993年5月,北京。
7. 何宇鹏、曹力群:《农村妇女地位、生育意愿和生育控制》,载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编《中国妇女问题研究论文集》第1~7页,1993年5月,北京。
8. Hollerbach, Paul E.,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 Critical Essay, in R. A. Bulatao and R. D. Lee et al(eds),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83.

(本文责任编辑:徐 莉)